

海陵旧话

鲜为人知的  
徐述夔首级案(下)

□徐继康

转眼就是过年。过了正月十五,那才算过完大年。一到正月十六,丁大坤立马着手他的计划。他想起了一个熟人,殷大魁,如皋西场(今属海安)大地主仲之琮家澡堂内的一名工人。如果先将徐述夔的首级放到仲之琮的田里,然后托名有人要将人头搁在仲家田内,再让殷大魁去送信说合,那仲之琮一害怕,肯定会出钱了结,到时白花花的银子就到手了。心动不如行动,丁大坤从来就是一个执行力很强的人。当天晚上,丁大坤即至梁垛空棺内取了人头,仍放篮内,用蒲包封好。十七日黎明,潜至仲之琮田间,将头笼安放。又恐怕那仲之琮不知道这就是徐述夔的人头,不晓得畏惧,便从路边捡了几根灯架废木,掏出随身所带的记账笔砚,在灯架废木的四面都写上“徐庚也回家”这五个字,然后同木笼放于一处。一切很完美,丁大坤收摊回家。

徐述夔别号废雅,一字耕野,丁大坤书“徐庚也”,说明他对徐述夔有一定的了解,毕竟清廷做了那么大阵势、那么多天的免费宣传。但写成了“庚也”,说明丁大坤还不够严谨细致。

丁大坤选择仲之琮是有原因的,第一,仲家很有钱。仲之琮的父亲仲以贞精通农、灶二业,富甲一乡。到了仲之琮时,更是声名远著,他美须髯,能诗,时写墨菊一两幅。其家有古树园,是东皋地区有名的词赋之地,仲之琮极喜交游,如郑板桥、李复堂、罗两峰以及皋邑文人逸士,画师名流,无不款留投赠。古树园结社联吟,可谓终日诗酒唱酬,集一时风雅之胜。第二,仲之琮很大方,舍得花钱。他一生慷慨尚义,对公益极为热心,嘉庆《如皋县志》这样记载他:“好善乐施,置文庙祭器助书院,膏火输货恐后。”第三,也是最重要的一点,仲之琮曾经因为徐述夔“一柱楼诗案”吃过亏。初有山阴文人胡西垞,落拓于江湖,仲之琮独礼之,留寓其宅,待以上宾。乾隆十三年(1748),仲之琮在胡西垞的怂恿下,以八十两银子从泰州邓孝威处购回《国朝天下名士诗观》的印版,胡西垞助其修补校订,计三集四十卷,并请来工匠将残者补之,修复完好后,印行于世。乾隆四十三年,徐述夔因文字而祸殃,仲之琮惊之下,将印版尽交至如皋县衙,再解通州、扬州府直至江苏省府,诗集内应禁之人的作品奉旨抽毁,原书仍行世。然仲之琮惧祸,竟未将印版领回,全部印版久贮于南京夫子庙中,不幸尽悉烧毁。仲氏门庭遭此变故,一蹶不振。由此丁大坤判定,仲之琮绝对患有很严重的“徐述夔恐惧后遗症”。

正月十七日那天黄昏,丁大坤赴仲之琮澡堂内洗澡,开始放风,说他听说有人欲将徐述夔人头搁在仲家田内,准备贻害仲家等语。并找到殷大魁,让其转告仲之琮,只要仲家愿意出钱,他可以出面代为了事。殷大魁不敢耽误,立即向仲之琮说知。谁知仲之琮觉得这话太过荒唐,竟然置之不理。第二天一大早,仲家有一佃户叫吴泰瑞,在田内发现有人头、木笼等物,连忙报之东家。仲之琮这才慌了神,思前想后,觉得丁大坤行径最可疑,遂到如皋县衙指名禀控。

十几年前,兴化诗人王国栋在游览古树园之后,曾作《古树行》一诗,其中有句“抱霜饱雪岁几改”“几经霹雳烧槎枒”。假如仲之琮此时再读,肯定会徒生几分唏嘘。

唏嘘的还有那位丁大坤,执行力很强的他立即潜逃,如皋县随后发出通缉令。这时,东台县令王耀先也接到保正姜昌林的禀报,得知徐述夔首级被失,成立专案组开展调查。乾坤虽大,小小的丁大坤又能跑到哪里去。没多久,丁大坤即被捕获到案。他这人倒也爽快,一切审供不讳。案情一点也不复杂,既无同伙,又没有另犯不法之事,事情到这里就简单了,接下来就该判决了。

然而判决却让县官老爷犯了难,因为在《大清律例》中没有找到相关的法律依据。后来通过查比,发现有一案件特别相似,曾经有一盗贼偷取所挂犯人首级丢弃水中,后依《清律·刑律·杂犯》规定“凡拆毁申明亭房屋及毁板榜者,杖一百,流三千里”而判处。“申明亭”是明清两代官方所建用以张贴榜文、申明教化的亭子,那所挂犯人首级与申明亭极为相似,也具申明教化的功能,可见大清官员并非一味僵化,倒也是灵活有度。只是此案乃朝廷重要罪犯徐述夔的首级,非寻常枭示尸头可比。那该如何判决呢?

经过反复斟酌,县里拿不定主张,向省里请示。江苏巡抚闵鹗元为一代名宦,以文学起家,名扬海内,精于治狱,所到之处,以清理积案见称,但他也拿不定主张,向刑部请示。乾隆四十六年(1781)十二月十一日,部里批复下来,完全同意闵鹗元的判决结果:

丁大坤胆敢窃取,图诈良民,实属不法,照例拟流,不足蔽辜。丁大坤请从重发往黑龙江等处,给与披甲人为奴。保正姜昌林将悬示首级失于看守,致被匪窃,殊属疏玩,应照不应重律,杖八十,再加枷号一个月,满日,折责革役。

丁大坤这一通折腾,终于领取了去东北著名流放地宁古塔的免费旅游券一张,并且获得为低级满族兵家奴的超级待遇。这是最重的三等流刑,离砍脑袋只差一步。其实也别高兴得太早,宁古塔常年冰封,是个非常恶劣的苦寒之地,一般流放者到那里很少能够活下来,真不知道丁大坤后来的运气如何。

大概是因为这个案子比较特殊,十几年后,经江苏按察使熊枚审定,沈沾霖在编辑《江苏成案》时,将此案收入其中,并于乾隆五十九年(1794)仲夏刻行,其编纂的目的,无非是为了方便各级地方衙门查阅和执行法律法规。他们在完成此项政治任务时,不经意间,为我们留下了这个真实而又荒诞的故事。



残废院老人合影二

南通老照片

如皋城里的几座石库门

□周思璋

今年5月28日《江海晚报·文化周刊·石库门的笑声》一文里有:“石库门是上海弄堂的一种典型住宅房,用石头做门框,用乌漆实心厚木做门扇,故得名‘石库门’。”那时不仅上海、苏州等城市弄堂里有不少住宅是石库门,在车马喧闹的大街上也有一些高大的石库门。石库门不仅可以防盗贼、防火灾,也能显示气派,招引顾客。但成本大,又不利于零市店,所以一些中小城市里就很少见有石库门。听老人说,如皋城里第一家石库门是清朝晚期北大街的承懋慎南货药材铺,相继有东街的恒昌和北门内古旧河巷的宝昌、西大街的恒大三家南货店,还有东街迎春桥东的冯永昌绸子布庄,都是石库门。经历了一个世纪的风雨沧桑,现在仅存冯永昌一家了。

永懋慎南货药材号

浙江省宁波府面临东海,“五口通商”后交通发达,商业繁荣。宁波商人足迹遍布国内外各大城市。太平军战役后,皖南、苏南和浙江一些城市残破不堪,苏北东部近海的城镇未经战火,成为避世的“桃花源”,人口增多,工商繁荣。有宁波府慈溪县商人童、孙、潘、李等姓合资来如皋,在北大街开锡箔庄,经营锡箔批发兼零市,后又增加苏烛、檀香、油麻、纸张等南北杂货和药材,买得朝东店房50多间,前店后作坊,在挞子门前又加砌了一座石库门,共有店员和工人六七十人。1938年日寇入侵苏北后,处处烽火,批发业务减少。永懋慎将南货部转让给如皋林梓人陈姓经营,至1954年停业。1956年中药部参加公私合营。二十世纪末北大街改建拓宽,永懋慎的石库门被拆。

恒昌南货号

清朝咸丰初年,太平军攻入苏南的南京、镇江、苏州、常熟等城市。这些城市的居民纷纷逃散。其中有镇江商人刘、潘二姓逃到如皋,正巧如城东大街有一家镇江人开的万元昌南货店,因无人继承,即将停业,于是刘、潘二姓合资接收此店,继续经营,店号改为“恒昌”。从浙江绍兴聘来工人,制造“双盖细芯飞花苏烛”,质量甲于江淮,由此声名鹊起。恒昌店门朝南,在东大街段家巷口,后门在古盐河南岸,前店后作坊和货棧。民国初年业务最盛时,有店员和工人50余人,年销货额30多万银元。后来又在挞子门前砌了一座石库门。由此农村顾客称为“石头大门”。民国十八年(1929),恒昌股东刘恭先等因刘姓子孙繁衍,在北门内开宝昌号。次年,徽商程幼海等合资在西大街开恒大号,皆经营南货,以批发为主,由此恒昌业务下降。时值苏北大水灾,赊销货款多数未能收回,又因江浙军阀交战,勒索军饷,不久日寇侵入苏北,百业萧条,恒昌逐年亏蚀,无法周转。此时刘姓资金已耗尽,改由潘逸尘

(之驛)与恒昌原店员张玉森等6人合资,勉力维持,不久改由潘逸尘独资,店名初改为“恒昌福”又改为“恒昌复”。1956年春,参加公私合营。恒昌原有店房除石库门不存,其余尚在。

潘逸尘(1903—1970),上海法政大学毕业。后以律师为业,1956年被评为如皋县工商业联合会主任,兼县人民委员会委员、副县长兼政协副主席。1958年春,被打为“右派”。

宝昌南货店

民国初年,恒昌南货店虽然盛极一时,但股东刘姓子孙众多,于是刘恭先等于1929年在北门内古旧河巷内另开宝昌,业务与恒昌相同。也自设烛淘,以批发为主,有店员和工人三四十人。不料开业次年苏北大水灾,宝昌有数万元赊销货款未能收回,因而周转不灵,逐渐亏蚀,终于在1935年停业。此后只好将店房赁给居民作住宅。1946年夏被国民党空军投弹炸毁,成为一片瓦砾。

恒大南货店

清朝后期,徽商程沆(海清)来如皋,经营火腿腌腊致富。他病逝后,企业由儿子继承,负责人程幼海,又在如城兼业五洋和木行。民国十九年(1930),程与谢瑞珍、蒋逢吉、朱锦堃合资法币两万元(程投资一万元),在如城西大街大寺巷西开恒大南货店,经营业务和恒昌相同,也砌的石库门。由此顾客称恒昌为“东石头大门”,恒大为“西石头大门”。由于恒大有腌腊和五洋、木材的资金可以互相调剂,且西街市场胜于东街,由此逐步发展,居全城同业之首。1938年春,日寇攻占如城,恒大货品遭劫,损失严重。又因烽火遍地,百业萧条,恒大亦渐渐衰落。1956年参加合营,“文革”期间恒大店房改建,石库门被拆。

冯永昌绸布店

冯永昌是目前如城仅存的一座石库门。他家创业人是一位挑担叫卖的“货郎”,自制香粉而外,兼售丝线、棉线、衣针、纽扣等零星百货,本小利微。他辛勤多年,积累了一些资金,于民国初年在东街迎春桥东,开了一小京货店。后又改业洋布批发,由此逐渐致富,积有资金十多万银元。店主年老病逝后,由他的儿子冯达伯继承。冯达伯见家大业大,一改他父亲的俭朴家风,生活奢华,是商界有名的少爷。又将店房、住房全部改建,店面改成石库门。不久遭遇苏北大水灾,赊出的货款有数万元未能收回;又因捐税繁重,以致逐步亏损,周转失灵,不得不停业清理,房屋抵还数家钱庄的货款。1938年日寇侵占如城,冯达伯年老无子,只好随姑娘逃往上海,不久病故。1947年至1948年间,店房一度赁给中国农民银行如皋分理处,1950年后作为国营如皋百货公司职员宿舍,现房子尚在。

嘉庆道光间的通州银价洋价

□管劼丞

根据通州信裕店嘉庆二十二年至二十五年(1817—1820)及道光四年(1824)的盘查现存账单附注,可以看到那几年的通州银价、银元价,并且可以计算出每元折银若干。所记嘉庆二十二年市用银价每两一千零二十文,洋价八百九十文,每元折银八钱七分三厘。二十三年,银价一千一百文,洋价九百零五文,每元折银八钱二分三厘。二十四年银价一千一百五十文,洋价九百文,每元折银七钱

八分二厘。二十五年,银价一千一百二十文,洋价九百二十五文,每元折银八钱二分六厘。又道光四年银价一千一百文,洋价八百七十文,每元折银七钱九分一厘。其时银元折银数都远较后来所谓洋厘为高,说明通行使用的银元不是从墨西哥转入的鹰洋,而是从西班牙输入的本洋。直到光绪年间,它才逐渐为鹰洋所代替,在清末还偶见所谓本洋,民国以后,市场上几乎绝迹了。